

# 蜀道申遗：串起千年历史“遗珠”

■本报记者 王剑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这样描写蜀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蜀道的开凿始于战国时期，这条惊险奇绝的古道可以说是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的奇迹。

近日据媒体报道，“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活动已正式开启，四川方面目前已确定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4条古道上的68处文化遗产点作为申遗支撑。

## 跨越秦巴，连通川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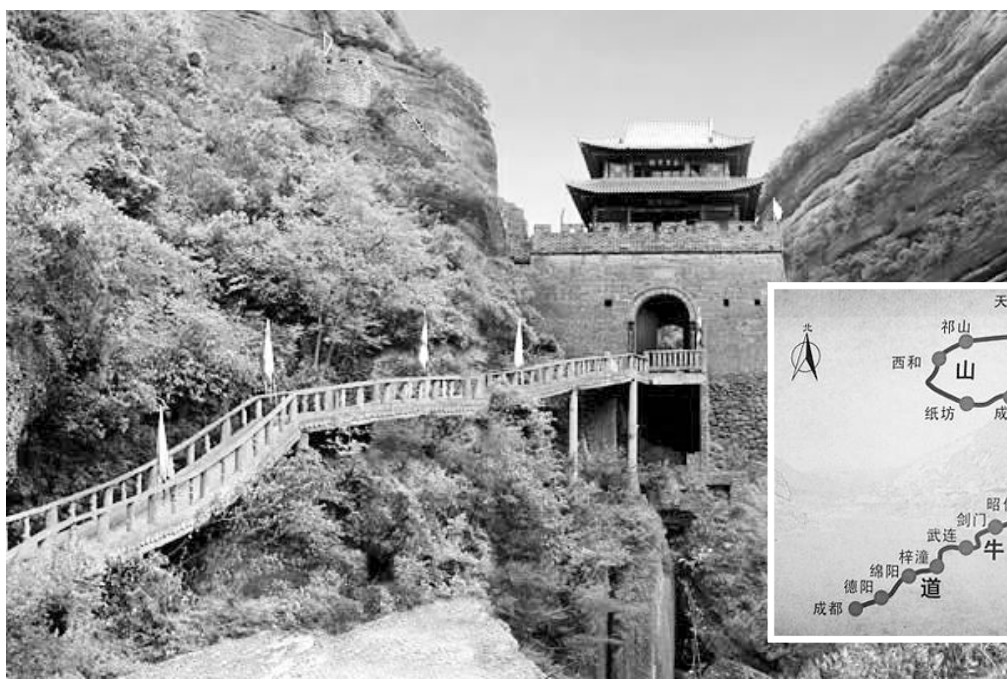
“蜀道艰险，走在路上总是心惊肉跳，面对高山峡谷、激流险滩，空寂苍凉之感油然而生。只有走到那里，才能更透彻地感悟人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敖盈这样向记者描述蜀道。

敖盈介绍，历史上最早通中原是秦国，司马迁有“秦固庇佑蜀国”之说，秦惠王为了打通去南方富饶的蜀地，在他与蜀王相会的地方安放了几头石牛，并在石牛尾巴下放了一堆黄金，意为石牛能拉出黄金。由于蜀王贪图黄金，同时由于道路艰险，石牛和黄金无法运到蜀国，于是蜀王就派兵力士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到了蜀国，于是就开通了“蜀道”中最早的一条道——金牛道，也就是李白所讲“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那段路。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东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继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后，古道申遗似乎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事情，“蜀道”申遗，首先要厘清概念，划定边界。“有明确界限”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对线路遗产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心目的‘蜀道’，主要指打通秦岭，连接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古道路。”王东林告诉记者，“这条线路，大体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褒斜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等组成。”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秦岭？王东林向记者解释，因为秦岭是川陕之间最大的交通屏障，就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



## 历史悠久 典故之道

东汉的《酈閼頌》中形容：“常车迎布，岁数千两，遭遇颍纳，人物倡望，沉没洪渊，酷烈为祸。”每年都有几千辆车从这里掉入河中，其险峻由此可见一斑。

敖盈告诉记者，蜀道主要由“天梯石栈”连接而成，由于木质结构的栈道耐久性较差，到了唐代，多用土石取代木材——所谓的偏道，即有坡度的岩壁上削坡铲石的土石路，外围设置有挡马墙，与现在的公路类似。偏道不像栈道那样平坦便捷，它更长，坡度更高，道路更崎岖，但是比栈道要经久耐用。

王东林表示，“蜀道”是“典故之道”，从秦惠王打通蜀中起，历朝历代，都与蜀道化生出不少

故事与传说，诸如“五力士拽蛇崩山”“蜀帝杜宇化子规”“火烧栈道”“寒溪夜涨”“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等，尤以三国历史和故事最为集中。

仅剑门一带，庞统、蒋琬、姜维、邓艾、马超、鲍三娘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故事和传说。王东林指出，今天，剑门蜀道是首批列入的国家级风景名胜，以剑门关为核心，北起陕西宁强，南到成都，全长450公里。沿线古迹有三皇堆遗址、德阳文庙、昭化古城、七曲山大庙、皇泽寺、千佛崖等，都是重要级别的文物。数百里古蜀道上，峰峦叠嶂，峭壁摩天，雄奇险峻，壮丽多姿，自然遗产瑰丽，文化遗产密集。

## 揭示价值 唤醒意识

程度的破坏，而且原因多样。

“蜀道”申遗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揭示价值”唤醒“保护意识”，王东林这样认为。申遗本质上就是价值认定，从地区遗产、国家遗产到世界遗产价值。这种价值的认定，对各相关地区有意义，并能带来切身的利好。“尽管我们经常说申遗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保护，并认为过程比结果重要。但是，申遗的号召意义和动员力不可低估。”

王东林坦言：“我认为申遗和保护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奔着目标去，每一步都对遗产保护有积极意义。”他同时指出，申遗工作首先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清家底，了解现

在王东林看来，蜀道最重要的价值是开启了中央政权同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蜀道之后，不仅汉中、成都盆地之千里沃野、膏腴壤土成为周秦汉唐的战略后方，更将山回路远、僻处文化之外的西南地区带入大汉文化圈，充分接受关中地区先进文化的辐射，从而跟上中国发展进步的整体步伐，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

即使在今天，古老的蜀道依然对秦巴山区现代交通体系的重构发挥了“先驱”作用。王东林告诉记者，宝成铁路大体循陈仓道；西宝高速基本循子午道；西商高速循褒斜道；川陕公路经陈仓道、连云栈道与褒斜道，至汉中后循金牛道达成都……呈现出明显的承接关系。

状；尔后是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拿出详细的保护规划，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呈现蜀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是申遗策略的研究，尤其是如何揭示蜀道遗产“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个性内涵，以及它的“全人类公认”“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

蜀道作为文化遗产或文化线路的价值，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价值影响人们的判断，影响人们的态度取向和行为选择。只有揭示价值才能带动政府和社会认识价值，进而珍惜价值、保护价值。

总之，研究越充分，保护越到位，行动越给力，目标就越接近。王东林信心满满地表示：“在历史上出彩的蜀道，今天同样会在世界出彩。”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八百壮士』与淞沪会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37天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

淞沪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守长江门户，其中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

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守军击毙。

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此即“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将军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

在战役的最后阶段，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



十九路军血战上海滩

营4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四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与此同时，上海人民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支持和鼓励着壮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四行仓库，支持壮士们抗击日军。战至10月30日，守军接到撤退命令，遂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次英勇作战，击退日军6次进攻，共毙日军200余名，中国军队以寡敌众，坚守四昼夜，被誉为“八百壮士”，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中国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中国守军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日军顽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迷梦。同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赢得了时间。淞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战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在滨海的不利地形下与优势敌人单靠拼消耗、拖时间，违背了持久战战略方针，也给随后的南京保卫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吕小羽编写)

## 看图说史

# 世纪末的“人机大战”

1997年5月11日，IBM公司制造的超级电脑“深蓝”在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对局中获胜，成为第一个在多局赛中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电脑，“深蓝”此次的胜利标志着电脑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卡斯帕罗夫17岁时就获得国际象棋大师称号，22岁成为世界冠军，是历来最年轻的世界冠军，也是保持这个头衔时间最久的人。卡斯帕罗夫因而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棋手。

“深蓝”是IBM公司研制的一台具有32个微处理器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计算机，其商用型号为IBM RS/6000SP。IBM公司的“深蓝”专家小组为其增加了专门处理下棋程序的模块。使“深蓝”的棋力大增，足以抗衡世界级的棋手。人与机器究竟谁更厉害？一场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机大战”于1997年5月3日在纽约拉开了序幕，在历时9天的比赛之后，卡斯帕罗夫最终以2.5比3.5的总分输给了“深蓝”。赛后卡斯帕罗夫感慨道：“我明白，人类在国际象棋塔尖的时日无多，我会尽力拖延几年。要战胜电脑只有一个办法：切断它的电源。”

此次较量是卡斯帕罗夫与IBM电脑的第三次较量。1994年，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前身交手，结果是卡斯帕罗夫大获全胜。而在“深蓝”出世后，卡斯帕罗夫就遇到了劲敌。根据比赛规则，每下一着棋一般以三分钟为限，而“深蓝”能在一秒种内分析二亿步，亦即五百亿个阵势，卡斯帕罗夫输给这个强劲的对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计算机在常规竞赛规则下打败了人类的世界冠军。绝大多数世界象棋专家以及相当多的计算机专家并没有预料到这会出现在20世纪出现。《巴黎观察》主编乔治·普林顿评论说：“这并不意味着机器将走出房屋，并且开始做非凡的事情。‘深蓝’是一个专门设计的机器，过一两年，计算机有可能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现在这个时候，我还能肯定。”

时至今日，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可是人类还来不及对这样的改变进行哲学上的思考。任何科技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朝一日，人类所创造的机器摆脱了人类的意志，不知那日的“人机大战”又将意味着什么。(沙森整理)



▲卡斯帕罗夫与深蓝对弈  
▲观战的人群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 科苑往事

1956年至1957年间，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发生了一场人才争夺战。这场争论是时势使然，还是另有玄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俗称“五路大军”。1954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中科院党组的一份报告中对科学院、高校和产业部门的“职分”进行了定位：“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因此在业务上，中科院与产业部门的重合度和竞争性分处科研链条的上下游，而与同样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大学及其主管单位高教部与中科院的关系较为微妙。

1954年9月，科学院不再被列为政府部门，1955年6月召开的学部成立大会上科学院被赋予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的桂冠。总体来看，当时中国科学院与高教部之间还比较融洽。从1956年1月10日起，二者通过双方共享人才和设备、共同组织科考队、代为培养青年科学家等活动开展合作，科学家还可在另一方兼职。此外，科学院与高教部还协商同年3月1日起合作筹建若干研究机构。

中科院与高教部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始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好还需车头带，车头动力首先要保障好，科研人员首先得跟上，这就给后来科学院理直气壮地“抢人”埋下了伏笔。

不久，“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赋予科学院以重任，科学院不仅要迅速组建计算机、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等号称“四大紧急措施”的尖端技术研究所，还要筹建其他一系列新的研究机构。这样一来，从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调集了有关学科的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在所难免。在全国科技人员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此举逐渐招致高校系统的不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6年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呈送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和《十二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重申“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当时中科院的待遇和整体研究实力较地方高校呈现出明显优势，一时间出现了“人心向党”的局面，众多高校的专家、教师们都希望到中科院工作。

眼看人心不稳，高教部和有关高校的领导开始坐立不安。北京航空学院的陆士嘉曾在普朗特身边学习火箭弹技术，他主动请调入科学院做钱学森的助手。北航不放人，钱学森请聂帅和总理要人而不得，双方一直闹到了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态度坚决，执意不放，说要留陆士嘉在北航“下蛋”。

高教部与科学院围绕人员调动频繁争执，最终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7年3月16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其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趁提议把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遗传学家谈家桢调到中科院，主持筹备遗传研究所。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杨秀峰着急地说：“你们把高校的著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大学还怎么办？”郭沫若因年少时和成年后先后得了肠伤寒和斑疹伤寒，有严重的听力缺陷。见杨秀峰的阵势，他激动地把助听器甩到桌上，说“火车头就是火车头”。杨秀峰也有点耳聩，大呼“要顾全大局！”二人吵吵嚷嚷不停。毛泽东笑着说：“请坐下，坐下！你们两个犄角不要吵了，我画个三八线吧！”毛泽东遂吩咐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讨论具体的“停战协定”。这场争论被称为“双尊夺珠”。

1957年4月8日至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主持，中国科学院大部分研究机构交给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认为基础研究部分应交给高等学校。对此，科学院党组先后两次表明态度，中国科学院必须继续加强，不能削弱。最终，聂荣臻副总理于1957年6月13日在国家科委第四次会上指出：“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他还说，中国有一个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同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定位。他还要求各个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相互协作。这场争论至此暂时停歇。

总体来看，这场争论是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我国科研人员供不应求的困难局面下发生的，文中所涉及到的中科院的定位和相关体制问题至今引人关注。(作者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 一九五七年中科院与高教部的『双尊夺珠』

■张志明